

明·万历十二年

富平县志

校注

[明]刘兑 修 孙丕扬 纂
徐朋彪 张立合 校注

陕西历代旧志文库
富平旧志校注丛书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明·万历十二年

富平县志

校注

〔明〕刘兑 修 孙丕扬 纂
徐朋彪 张立合 校注

陕西历代旧志文库
富平旧志校注丛书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平县志》校注/ (明) 刘兑修, (明) 孙丕扬纂;
徐朋彪, 张立合校注.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6. 1
(陕西历代旧志文库. 富平旧志校注丛书)
ISBN978-7-5518-1220-7

I. ①富… II. ①刘…②孙…③徐…④张… III.
①富平县—地方志—明代 IV. ①K29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1067 号

陕西历代旧志文库·富平旧志校注丛书

《富平县志》校注

[明] 刘兑 修 孙丕扬 纂

徐朋彪 张立合 校注

责任编辑 高 峰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5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978-7-5518-1220-7

定 价 7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hs.cn>

本书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香港政府资助局（课题
编号：440808）资助出版。

万历《富平志》校注本序

张世民

地方志书作为一种区域历史著述，明清时期有过不同的学术品格。清代考据学盛行，不少志书以文献爬梳为主，很少凸显作者的主观臆见；而明代理学盛行，所以志书中不乏言理之作，作者的观点也常常直接表露出来。相比而言，那些“寓褒贬于叙事”的史志笔法，之所以得到历代学者的共同青睐，原因就在于它不直露、不妄断、不牵强。不过，被列入清乾隆《四库全书》的明代关中方志，诸如康海正德《武功志》、孙丕扬万历《富平志》等等，其共同特点均在于运用道德话语体系来评判是非，黜陟人物。惟因撰稿人思想境界和社会履历不同，两志又具有迥然不同的个性气质、气度。

万历甲申（1584）《富平志》撰稿人孙丕扬，字叔孝，原系富平人写富平志，其熟悉家乡的程度自不落人后。这个甲申之年，距离明朝灭亡只有一个“甲子”，乱世凝构，其所宣扬的思想道德立场，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品格。在顶层设计上，作者有师法康海之处，但更注重综合罗列，反映了独立的思想政治观念。正德《武功志》分七卷，分别是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而万历《富平志》共分十卷，包括“两考”（地图考、选举考）、“两传”（官守传、乡彦传）、“六志”（地形志、建制志、祠祀志、田赋志、习俗志、沟渠志）等，“其所纪载，有关国计民生，为门凡十，条理井井，而简严古质，卓然一家之言”（清乾隆吴六鳌《重刻孙立山先生富平志序》），实较康志更宽泛、更深入，更具有丰赡性。就分门别类而言，这部县志言必成理，也体现了明代学者的共同学术语范。《富平志》监修、县令刘兑如是说：

地图志，见疆域之指顾；地形志，见山河之错综；建制志，见（俊）〔郡〕国之兴盛；祠祀志，见邪正之崇黜；志官守，系去思也；志乡彦，崇往献也；志选举，尚人材也；志田赋，重民命也；志习俗，端风教也；志沟渠，开利源也。是志也，无一不当于理，益于民，可遵可行，以敷于治。（明万历《富平志》刘兑叙）

同时，地方志的著述基础在于地理。这里的地理，包括沿革地理和自然地理两方面。前者以行政建置为主，后者则以自然环境为主。与正德《武功志》相比，万历《富平志》更突出了地图、地形和沟渠等内容。在展示主观臆见方面，康海总是隐身的、含蓄的，将主观意愿融汇于行文叙事，其褒贬立场也孕育其中；而孙氏不置身事外，不悬臂轻走，随时以“频阳人曰”名义，对县域环境、资源和发展现状逐项加以解剖。譬如：

富平当关中北山之麓，为方百里者一，山川奠于斯，邑里建于斯，沟渎垦于斯，欲展卷而邑境了然心目间，甚矣，图不可已也。（卷一图考）这是地理总括。

富平全境，盖百二县中形胜地云。负频面荆，带以石温，而浮山凤凰，若左右翼，四塞之地，又黄壤也，非蕞尔一奥区哉。（卷二地形志）这是地形概括。

今富平物力，岂洪武初比哉。初，里四十有四，旋逃亡者多，兼金定、仁和、太平、忠厚四里于四十里中，补诸甲缺。今则甲户可并，又奚止四里已也。嘉靖间，陕直指使者梁君一魁疏：富平当耀州南境，近府而远州，宜直隶西安便。……夫梁君建议，初为省民，渭南诸县皆隶府矣，富平独中阻之。（卷二地形志）这是建置意见。

频山当美原北（廓）〔郭〕外地，鼎足于宜君、白水、富平间，山深甚，鼠窃者巢焉。……为目前燃眉计，其复美原故巡检司善乎！夫曲突徙薪之见，不显于焦头烂额之近功。体国君子，可不预桑土谋哉！（卷三建制志）这是治安建言。

富平疆域，盖二百里。北有山谷，多石沙地，当县田十分之三。东盐泽停蓄，若湖波然。西盐滩水草，盐脉日浸移于良田中，而漆、沮、温泉、金定四水者，又澎湃于山陵之麓，岁秋时辄崩溢，以坏民亩，历数岁或不得一熟。山河盐卤之外，计可耕田仅全境三六分耳。（卷八田赋志）这是经济环境。

富平为丰镐北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勋业节义，接踵前修，敦厚力本，遍满境内，皆本于土地所钟如此。（卷九习俗志）这是历史特征。

富平北鄙，频山岑崱，厥田最亢，雨暘少愆，即艰食之庶姓接踵矣。（卷十沟渠志）这是水文特征。

总之，作者采取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切合现实，把握尺度，集中表达了治国经世的娓娓匠心。对于富平县在陕西关中、在西安府的地理位置，以及在政区隶属、行政建制、田赋物产、民俗民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大都站在便民、省民和爱民的立场上加以分析。与此同时，有关县域经济中的微观亮点、特色，作者也不吝笔墨，予以称赞。譬如有关富平墨玉、韭蒜的记载如是写道：

北山青石细润，可镌字、琢磬、砌堂阶，人号墨玉。以此取足者无虚日，富平人亦日蹙额之，为其采伐重而递运艰也。石灰之产，难亦如是。（卷八田赋志）

附（廓）〔郭〕之韭，浮泽之蒜，历昼夜味不变更，则地气钟然。其他布帛、菽粟、昆虫、草木、牝牡、骊黄，全陕共者不具。（同上条）

古人云：志书半人物。其大意，指志书中各类人物所占比重可达到一半左右。志书中记载人物始于北宋，这些人文资讯的增加，标志着志书从地理属性向历史属性的重大转变。明代志书中记载人物，大都有褒无贬，康海《武功志》首开“褒贬官师”的先例。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不赞成康志过简

的做法，但也肯定其“惟《官师志》褒贬并施，尚为直道不泯，稍出于流俗耳。”（章学诚《书武功县志后》）康海仕途挫折，放浪形骸，虽曾修撰《成化实录》，毕竟官场阅历有限；孙丕扬则政学兼修，其居高临下的官方立场，纵横捭阖的价值判断，以及挥洒自如的如椽巨笔，都影响着志书的著述效果。“频阳人曰”大抵类同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明代马理《陕西通志》中的“雍人曰”，其设目宗旨可谓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在《官守传》、《乡彦传》和《选举考》中，作者黜陟人物的道德话语立场昭然若揭，令人钦仰。作者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乡井人才，何莫不由地灵出哉。富平襟带山河，固贤哲挺生所也。（卷六乡彦传）

富平建县官，典司四民；建学官，典司三士。两寮备而县学之政教举矣。……汉唐诸彦，游此土者，间有可考。近则碑口益多，是故书之。其有官不尹师，泽被苍生，亦并纪之，示不敢忘也。（卷五官守志）

举凡列入传记的官守人物，孙志更是褒贬并举，黜陟同在，反映了作者超越现实的直书态度。受褒扬者如“王杰，字时英。天顺三年以监生为县令。多才能而富问学，识政体而练民情。当其时，新县治，修圣宇，声名藉甚，诚能吏也。”（卷五官守志）受贬抑者如“王钟，宏治十四年任县令。为人放达不检，以故事多孟浪，素善里长某姓者，见罪妇色，即妻之，迄今传为笑柄。”（同上条）

在史实取舍上，孙丕扬十分重视人文地理和历史事实的挖掘与整理。凡是发生在富平县境内的历史事件，他都不吝笔墨，予以记载。譬如汉唐人物，其收录标准相当广泛。陕西关中有唐代十八座帝陵，其中定陵、元陵、丰陵、章陵、简陵等五座分布于富平境内，这与当地土厚民淳的环境密切相关，遂使富平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埠之一。同时，对历代田赋、沟渠和礼仪问题，作者也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立场。他认为衡量志书质量高低的学术基准，正在是否有利于治国理政。田赋为立国之本，祭祀为治国之本，兵戎乃安国之本。县志中有关上述问题的记载，无疑有其现实的意义。作者称：“彰善癉恶，风俗之关键系焉。”（卷三建制志）“邑之大事在祀典。”（卷四祠祀志）

“国本乎民，赋因乎地。户籍田赋，邑政大纲寓焉。”（卷八田赋志）“乡必有俗，其闾里之相率而群趋者乎。”（卷九习俗志）当时被列入县志的乡贤杨爵说：“大人以治安之时为危乱，小人以危乱之时为治安。”（《明儒学案·三原学案·忠介杨斛山先生爵》）足见盛世必虑及危乱，而乱世必虑及治安，“居安思危”，正是富有辩证思维的治国理念。

在史笔运用方面，该志行文简练，饶有理致。在文字剪裁上，作者拥有大量的原始文献，但却出之以晓畅叙事，其可读性难能可贵。富平县人才辈出，明代杨爵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作者为杨爵立传，肯定了杨氏的气节和修为。杨爵，字伯珍，因勇于谏诤而获罪。在著述风格上，一贯主张：“文章以理为主，以气为辅。所论纯是一段义理，是以理为主；辞气充盛浑厚，不觉软弱，是以气为辅。须胸中正大，不以偏曲邪小之见乱其心，又广读圣贤格言以充养之，如此则举笔造语，皆是胸中流出，其吐辞立论，愈出愈新而无穷也，如取之左右逢其源也。其腾汇泄蓄，流转浑厚，波澜汪洋，如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其光焰发扬照耀，昭灼如日月中天，深谷穷崖之幽，花石草木之微，青者自青，白者自白，仰之以生辉，触之而成色也。”（《明儒学案·三原学案·忠介杨斛山先生爵》）拜读万历《富平志》，其所涉及叙事、状物、记人、言俗，皆能感受到一种磅礴而华畅、质实而耐读的语风、文魄，令人深感隽永可读。

值得注意的是，孙丕扬直道不谄的履政经历，既是其政治品格的突出体现，更是其独立不倚、秉笔直书的人格保障。孙氏登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随后长期担任御史职务。《富平志》的编纂，于万历癸未六月始事，甲申正月落成，当时孙丕扬以右副都御史家居，遂接受县令刘兑的建议参与修撰。有关地方志的地位和作用，孙丕扬说：“夫经降而史，史降而志者，世道也，不可强也。志一变至于史，史一变至于经，不存乎其人哉。”这就将地方志提升到与经学、史学比肩的高度。他又说：“夫士善乡，乡仰之；士善国，国仰之；士善天下，天下仰之。总之在自树耳。”（《富平志》万历甲申正月人日频阳人孙丕扬叙）这也就阐明了一介公共知识分子与所在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时人称其“一皆崇忠孝而黜浮靡，右德义而左权力，不逐逐于雕章绘句间”（张正化、张执《富平志序》）。到了万历二十二年，垂暮之年的孙丕扬官拜吏部尚书，成为当朝重臣。因其“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独患中贵请谒，乃创为掣签法，大选急选，悉听其人自掣，请寄无所容，

一时选人盛称无私，然铨政自是一大变矣。”在激烈的朝野政争中，他“以白首趋朝，非荐贤无以报国”，尝与吏部侍郎、掌翰林院叶向高一道被称为“秦脉”，其反对派认定“秦脉斩断，吾辈可以得志”。后来孙丕扬屡疏求退，“家居二年卒，年八十三，赠太保。天启初，追谥恭介”。

孙丕扬援引民谚云：“言尺不如行寸。”这一“行动第一”的思想观念，值得我们认真探索与思考。治国理政，需要躬身参与；修史编志，更需要社会实践。地方志事业走出书斋，走向现实，是提升志书学术质量、应用价值的必由之路。万历《富平志》的撰写，不同于寻常志书之处，正在于独立不倚的褒贬和重视现实的立场。人常说地方志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其历史价值仍须当代传承，缺乏当代的实用性，也就谈不上所谓千秋利益，这也是孙丕扬给予我们的重要启迪之一。

谈及传统文化资源时，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14年1月1日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旧志文献要发挥好现实作用，同样必须通过系统梳理和活化译介，使之成为我们认识国情、地情，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万历《富平志》作为宝贵的地方文献，在激活基本国情、地情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如今原有线装版本早已罕见，一些影印版本也不易找到，因而在新的阅读环境下对此加以梳理，可谓功莫大焉。徐朋彪、张立合两位同志有志于此，倾注了全副的精力予以校注，并着眼于校勘质量，以便于普通读者的披阅，这种有益于世的做法值得称道。校注者为我提供了重温名志的机会，并嘱咐我写几句话，因职业所在，不容推辞，惟言之未必惬意，尚祈读者批评。

是之为序。

（作者为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处长）

富平旧志校注丛书序

孙立新

富平县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明清曾多次修志。最终成书的主要有五种，分别是：刘兑修、孙丕扬纂万历十二年（1584）《富平县志》，乔履信纂修乾隆五年（1740）《富平县志》，吴六鳌修、胡文铨纂乾隆四十三年（1778）《富平县志》，樊增祥修、谭麀纂光绪十七年（1891）《富平县志稿》以及清末佚名传抄本《富平县乡土志》。这些旧志历经沧桑，有的已经濒临失传，因此亟待整理、校注和出版。令人欣喜的是，我的忘年交、富平籍青年俊彦徐朋彪和三秦出版社合作出版富平旧志校注丛书，这的确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据我了解，朋彪最早翻阅富平旧志是在撰写《富平方言调查研究》的时候。因为要了解富平县的历史沿革、人口、民族等，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才有了一个大略的认识。2013年春节他回老家，和县志办退休干部张立合先生聊及孙丕扬《富平县志》，才萌生合作校注、整理的念头。张先生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对富平的历史地理、民俗风情非常熟悉，朋彪则有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底子，可谓人尽其用、各得其所。言尺不如行寸。随后，他们便着手这项繁难的工作，一直到2015年暑期才拿出这套丛书第一本孙志校注的初稿。最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通读了这部志书，使我大开眼界，受益良多。下面谈谈我阅后的几点感受。

一，收集的历代富平县志版本齐全，方便对校。除署名富平的五部外，还有明嘉靖乔世宁所撰《耀州志》。孙志校勘的工作底本是《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所载录的清乾隆四十三年重刻孙立山先生《富平县志》，参校的版本有西安博物院藏明万历《富平县志》、佚名据重刊本所录手抄本两种。

二，标点、分段科学。诚然，要做到准确无误，难度是相当大的。工作底本的篇章结构和顺序没作改动，对原作者的主观判断和表述也不作修正。孙志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点校要做到准确无误，实属不易。他们的原则是先根据古代汉语语法断句，再标以现代书面语标点，可有可无的标点尽量不使用。本校注本标点执行《标点符号用法》的标准，文字则变繁体为简体，变竖排为横排，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校勘、注释并重。本次校勘只针对全志的用字问题，志中所记述的史实不在本次校勘的范围之内。两位校勘者严格执行对校原则，在对校基础上辅之以适度理校。对校勘中发现的“脱、衍、倒、讹”等用字问题，一律出校说明。正文仍保留原书面貌，无一字径改。原版中的阙文则以方框填补，亦出校指出。例如孙志中人名“王翦”之“翦”，《史记·王翦列传》、《中国人名大辞典》均作“翦”，依其例，在校勘中予以说明。再如第五卷官守传之李寿昌，原文为“正德□□年以进士为县令”，年份不确，现依乔履信《富平县志》，在校勘中补为“正德二年”。在注释方面，兼顾人名、地名、年号、职官等术语，酌情对一些难理解的生僻字词与历史文化知识、名物典故等等进行必要的解说；统一采用段后注的方法，注释数码用带圈数字表示。为了方便读者，对年号、地名、职官等注释各页不避重复。

四，除了书斋里的文字工作，他们还非常重视实地走访、现场勘查，以加深理解并核查县志中的记录。例如他们亲自查看了东、西三尺岭的地理位置，了解了富平、白水两地争水的历史事实，还登上荆山塬、拜祭唐五陵，这样会使他们的认识不再空洞，校注工作建立在更加脚踏实地的基础之上。

我自从1982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的几十年里，一直把地方志事业当作重要的业余工作，跟省内外许多地方志机构都有联系，跟许多同仁感情深笃。因此，对于朋彪他们的这一重要工程非常重视。

大家经常说：盛世修志。改革开放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进步，给人民带来一系列实惠。但是，回过头来看第一轮修志，那时候我们的经济情况远远不能跟今天比。而这一次全国普遍进行的第二轮修志，是在各项事业突飞猛进的基础上开展的，就各地的经费情况来看，就比第一轮充裕得多。在这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又伴随着旧志整理、校注、出版等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这些实在都是可喜可贺的！我们欣逢盛世所享受的福祉何止这些？

朋彪是我们方言学界好几代人都很认可并且寄予很大希望的青年学者，他在方言学领域已经有了一定的建树，即将有标志性成果问世，这个标志性成果就是他和日本著名学者秋谷裕幸合著的《韩城方言调查研究》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最近一段时间，他就有两本合著出版，我们大家都为他的扎实认真精神所感动。朋彪这样的青年俊彦能够以北宋大儒眉县横渠张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勇于担当的精神对待事业，作为共产党员的朋彪，积极践行着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理念，这是党和国家的大幸！

朋彪的为人文都很稳健，我坚信，他以后还将奉献给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许多珍贵的文化大餐的！

旧志整理难度大、专业技术性强，希望他们把第一本书中好的做法贯彻到这套丛书后面的每一本中去，一边整理校对，一边学习体会，不断积累经验，做到尽可能好。

（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前 言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据 1985 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共有 1949 年以前编纂的省、市、府、州、县、乡镇志 8264 种。这些浩如烟海的方志典籍,是一座信息密集的知识宝库,为我们了解祖国各地的历史地理、人物轶闻、艺文著作、风俗民情等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材料。由于旧方志刊印数量较少,流传分布不广,而且今人读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和隔阂,所以亟待对其加以校勘、注译,使其成为人人的案头读物,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富平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明清两代曾多次修志。兹列举成书者如下:

万历《富平县志》,明刘兑修,孙丕扬纂,万历十二年(1584)刻本刊印。此志为明代关中八部名志之一,10 卷,分图、考、传、志 4 大门类。采摭丰富,文词典雅,考证精详。全志约 8 万字,共 4 册,每半页 9 行,行 20 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千顷堂书目》著录。据第一批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和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记载,今藏西安博物院、美国国会图书馆。另外,全国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也有其全 1 卷胶片载体形态复本。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吴六鳌重刊明刻本,题曰《重刻孙立山先生富平县志》。此本共上、下两卷,流传甚广,《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有载录。后亦有佚名据重刊本所录手抄本传世。西安博物院藏本共上、下两册,十卷,保存品相完好。与吴六鳌重刊本相较,此本仅多一《助刊姓氏录》、少一《重刻孙立山先生富平志序》而已,其余内容皆同。

乾隆五年(1740)《富平县志》,乔履信纂修。此志共 8 卷,约 18 万字,是在韩文《富平县志稿》的基础上修补订正而成,分星野、建置、山川、河渠、赋役、乡甲、学校、典礼、职官、选举、名宦、人物、祥异、艺文,共

14 门类, 21 个子目, 记事至清乾隆五年。《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载录。

乾隆四十三年(1778)《富平县志》, 吴六鳌修, 胡文铨纂。全书共 8 卷, 约 20 万字。卷首有毕沅序、吴六鳌序, 内容包括地理、建置、贡赋、水利、职官、选举、人物、艺文, 下设 29 目, 有图 6 幅。《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著录, 流传较广。

光绪《富平县志稿》, 清樊增祥修, 谭磨纂, 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光绪十二年(1886)樊增祥任富平县令, 次年即邀谭磨纂修县志, 约于十五年成书, 光绪辛卯仲春开雕。全志共 10 卷, 约 40 万字。卷首为谭磨叙、刘锬叙、纂修姓氏、捐梓姓氏、目录、例言、宸翰。卷一地理志, 卷二建置志, 卷三风土志、艺文志、金石志, 卷四经政志, 卷五人物志, 卷六人物志下, 卷七仕宦表、职官表、官师志, 卷八节孝志, 卷九节孝志下, 卷十故事志。此志体例精核, 载述详尽, 言简意赅, 不失为清代方志名著。台湾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载录。

《富平县乡土志》, 清末佚名传抄本。无序跋、弁言, 成书确切年代、纂修者难以定论。全志约 15000 字, 极为简括, 《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乡土志抄稿本选编》均有载录。

对上述这些珍贵的旧志、史料, 我们将逐一进行整理校注, 总名为《富平旧志校注丛书》。旧志整理难度大、专业技术性强, 我们不揣谫陋, 先对孙丕扬《富平县志》予以点校, 借以抛砖引玉, 期待后出转精者出。

凡 例

一、此次校注以《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中所载录的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刻孙立山先生富平县志》为底本，又参校西安博物院藏明万历《富平县志》、乾隆五年（1740）《富平县志》、乾隆四十三年（1778）《富平县志》、光绪《富平县志稿》诸本，择善而从。

二、篇目顺序仍依原版，全书用规范简体字横排。

三、对校勘中发现的“脱、衍、倒、讹”等用字问题，一律出校说明。校勘之处以汉字〔一〕、〔二〕、〔三〕等在需要出校的字、词句后标示，校记置于本段末。凡改动原志的地方，用方、圆括号表示：圆括号（ ）内表示删去，方括号〔 〕内表示改正。避讳改字予以纠正，以（代字）〔讳字〕方式表述，如（元）〔玄〕、（宏）〔弘〕等。异体字均改为规范简化字，通假字一般不改，仍依其旧。原版中的阙文则以方框填补，亦出校指出。

四、在注释方面，兼顾人名、地名、年号、职官等术语，酌情对一些难理解的字词与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解说。统一采用段后注方法，注释数码用带圈数字。为了方便读者，对年号、地名、职官等注释各页不避重复。

五、出列条目基本遵循“释词不释句”的原则，所出条目均为词或短语，一般不以句子出条。

六、注释所依据的语文类工具书主要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辞海》、《词源》、《汉典》、《故训汇纂》、《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几部权威性的辞书。历史文化知识方面主要参考《中国方志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传记丛刊》、《辽金元传记资料丛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西北文献丛书》、《陕西金石志》、《中国方志丛书》、《长安志》、《陕西省志·著述志》、《陕西通志》等著作来注释。

七、影印工作底本木刻原图图版有些漫漶，我们依据原文和其他版本重

做文字并修补线条，仍以原顺序排列。

八、注音用汉语拼音字母，一律标注在字后圆括号内。

九、对本志作者历史观及用语不能苟同之处，不出校纠驳。